

注重“学者鲁迅”，并不独尊迅翁

□陈平原

2021年底，北京三联书店推出我的《小说史学面面观》，其中第一章《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是根据我此前的若干文章改写的，没有多少新意。倒是此书“小引”中这段话有意思：

在中国，“小说评论”早已有之，“小说史学”则只有一百年历史。具体说来，1920年可视为中国“小说史学”的元年。理由何在？这一年的7月27日，胡适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水浒传考证》，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这一年的8月2日，鲁迅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专门讲授中国小说史，1920年12月24日第一次登上北大讲台。一是发凡起例引领风气的长篇论文，起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现代大学设立的正式课程，可培养无数专业人士。

经由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的积极推动，作为“学术研究”的“小说史学”迅速崛起，百年之后，已然蔚为奇观。就在“小说史学百年”这个节骨眼上，因新冠肺炎疫情改为线上授课，促使我完成了《小说史学面面观》这册小书。

若问我的鲁迅研究有何特点，看得见的是注重“学者鲁迅”，比较隐晦的是并不独尊迅翁。十年前，接受媒体采访，谈我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师承以及文体，何时提出“压在纸背的心情”，以及为何同时经营专著与随笔等，这些都很平常，只是问及“如果要您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您会选择谁”，我的回答出了问题：

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中，我再三强调，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人际关系到思想学问，都密不可

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读八个人的文集：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周树人、刘师培、周作人、胡适。故意不按各自登台表演的时间，而是出生年月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是如何“犬牙交错”的。既然是“尚友古人”，为何要求“择一而交”呢？又不是男女之间谈恋爱。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说是八人，但因王国维与刘师培的学问比较专门，常在我及我的研究生们眼前晃动的，主要是其他六人——谈及晚清与五四，不管什么题目，都必须考虑他们的立场及反应。前半段没问题，引起争议的是最后一句。虽然我解释“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的说法乃互文修辞，还是会被抗议：难道胡适可以跟鲁迅相提并论？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说法，认为这么说贬低了鲁迅。可我确实认定，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政治，最合适拿来与鲁迅相提并论的，还是胡适。基于此信念，我曾 在香港中文大学（2014年秋）与北京大学（2015年春）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课“鲁迅与胡适”。不同点在于，在港中大我多讲鲁迅，因那边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课程；而在北大，鲁迅研究是主流，我必须更多为胡适辩护。

近年所撰几篇涉及鲁迅的文章，如《鸚鵡救火与铸剑复仇——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2017年）、《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2018年）、《“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1920年代

的美文》（2018年）、《二周还是三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周建人》（2019年），自认为都写得不错；当然，最得意的还是第一篇——讨论鸚鵡救火与铸剑复仇到底哪种策略更有效或更值得推崇，以及“杂感”与“论文”的缝隙如何积淀乃至内在限制了鲁迅、胡适各自的政治立场、精神气质与《中国小说史略》校注论述方式：

就以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伟人来说，其差异性几乎一目了然，可你很难非此即彼。具体的应对措施，确有对错与高低；但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异，裂缝主要缘于理想与现实、激进与保守、言论与行动、自我与社群，乃至阴阳柔刚的性情等。……理解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理论模型，但不将其绝对化、理想化、本质化，而是承认二者常处于流转变动中，各自都在根据时代潮流与自身志趣不断地调整方向，以达成最佳的精神及工作状态。

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同样，胡适也是我的精神导师。这么说，估计很多人不能接受，他们更习惯于“独尊一家”，非此即彼。可我的“万神殿”里，供奉的远不只一两个偶像。不同偶像之间会有缝隙与矛盾，这个时候，你可以左顾右盼，互相敲打与质疑，借此锻炼自家的心智与境界。

读鲁迅、胡适的书，不一定走鲁迅、胡适的路，有时候是个人能力有限，有时候则是外在条件不允许。与其高自标树，尽说漂亮的空话；不如脚踏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这里包含我对大道朝天、文化多元性的理解，还有对人生局限性的深切体会。

（本文节选自《〈中国小说史略〉校注》后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小说史略》校注
鲁迅 著
陈平原 鲍国华 编注
浙江人民出版社



《特洛伊的海伦：女神、公主与荡妇》
[英]贝塔妮·休斯 著
曾小楚 译
理想国 | 九州出版社

守望时代净土，情怀恒久不渝

□陈佳佳

“好人家园，传递温暖”，8年前，首个在全国公开发行，传播雷锋精神的专业杂志——《雷锋》正式创刊。为现实生活注入模范力量的《雷锋》杂志，连续获得“中国最美”“青少百优”等多项荣誉。一本好杂志总是能感知时代脉动，记录社会温度。在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61周年之际，《雷锋》杂志社于泉城济南推出“弘扬雷锋精神书刊文创精品展”，再次回顾了《雷锋》问世以来的文化成果及文创作品。

“我国近万种期刊的百花园里，《雷锋》杂志创刊的意义不仅在于填补空白，更在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营养而诞生的雷锋精神文化，在当下的记录和展示有了更为厚实的载体。”《雷锋》杂志编辑部在发刊词中，曾这样表述书刊出版之于当代的意义。即，坚守信仰，接续温暖，传承正能量。

“雷锋”作为一种精神符号，仍需找到新时代的文化代言，以赋予其赓续恒久、绵延不断的生命力。众声喧哗，何以细心聆听历史回声，寻觅向善向上的价值？《雷锋》杂志社始终深信社会真善美的表征价值，他们凝结智库力量，以可考的文字、可靠的行动响应时代感召，传递好人温暖。正如创刊之初总编辑陶克在出版座谈会上言明的那样，《雷锋》杂志的

优势在于“立场鲜明，权威性、公信力和不可替代性”。坚守社会良善净土，扩大时代正向声量，《雷锋》杂志坦率的办刊态度，让它区别于其他社会期刊，赋予雷锋精神新的活力。

61年前的初春，“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首次发表，随之掀起了一股向上向善、学习进步的时代春风；继续出发，向内纵深，创制一本“以刊育人”、培养“活雷锋”的定期宣传物，却足足等了52年。时光恒远，岁月悠长，《雷锋》杂志的创办是“学雷锋”活动开展多年后的大势所趋，也是新时代雷锋情怀积攒下的众望所归。作为跨时代楷模，“雷锋”的闪光形象不曾褪色。正如人类与生俱来的对美的追求一样，人类对至善的向往同样生发于心，不会更改。2015年，经过两年的筹划酝酿，《雷锋》杂志正式创办。作为中国出版史上唯一以人名命名的期刊，它的诞生显现了平民楷模的群众号召力，也印证了“善”的信仰历久而弥新。观照社会现实，聆听时代心声，雷锋身为贯穿杂志的灵魂人物，其舍己为公、无私奉献的大爱信念，同样赋予了杂志前所未有的温暖气质。

创刊至今，《雷锋》已成长为守望正义的“人文美德期刊”。2023年9月起，杂志细化受众渠道，从月刊转为旬刊，走入单位、部队和学校。回首办刊团队“办一本有态度、有温度、有厚度的杂志”的理念追求，

《雷锋》正在朝着“内容分众化、传播数字化”的道路迈进，逐步成为德育媒体的典范。回归良善，接续温暖的“学雷锋”，无异于一顿“精神大餐”，滋养枯萎的精神花园。当心灵无处可依时，不妨向内走，往里探。构建话语，传达思想，《雷锋》杂志以“雷锋”为中心，辐射出的真善美追求正是对主流文化的弘扬。

传递温暖，以刊育人，《雷锋》杂志除解码英模人生，还专注于寻找身边好人，构建好人家园。每个值得被关注的好事践行者，都是对新时代“雷锋精神”的生动注解。每期《雷锋》杂志的封面人物，作为被遴选出的道德楷模，都给新时代“雷锋内涵”赋予新意。从老红军战士王定国到“当代雷锋”郭明义，从军旗下走来的创业先锋张丰到援非护士王新华，从劳模工程师李政到公益植树人廖理纯，各行各业的“好人”样本拓宽了昔日模范的边界，凝聚出向善向美的社会共识。

除了纸质刊物，雷锋杂志微平台、相关APP、短视频的研发，搭建起“好人”的文艺家园，让温暖跨越时间、空间，打破冷漠隔阂，和每个独行的你相聚。

